

国外语言学译丛
经典著作



言语地理学
·
の
·
方法

语言地理学方法

〔日〕柴田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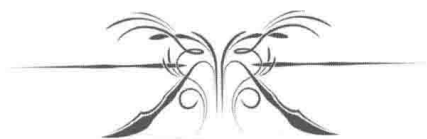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外语言学译丛

经典著作



言语地理学

の

方法

语言地理学方法

〔日〕柴田武 著

崔蒙 译

张维佳 审订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地理学方法/(日)柴田武著;崔蒙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国外语言学译丛.经典著作)

ISBN 978-7-100-16237-1

I. ①语… II. ①柴… ②崔… III. ①地理语言
学—研究 IV. ①H0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265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国外语言学译丛·经典著作

语言地理学方法

〔日〕柴田武 著

崔 蒙 译

张维佳 审订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237-1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1/4

定价:28.00 元

言語地理学の方法

柴田武 著

GENGO CHIRIGAKU NO HÔHÔ by Takeshi SHIBATA

Copyright © 1969 by Sada SHIBAT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69 by CHIKUMASHOB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IKUMASHOB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国外语言学译丛编委会

主 编：

沈家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编 委：

包智明（新加坡国立大学）

胡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李 兵（南开大学）

李行德（香港中文大学）

李亚非（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潘海华（香港中文大学）

陶红印（美国加州大学）

王洪君（北京大学）

吴福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袁毓林（北京大学）

张 敏（香港科技大学）

张洪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朱晓农（香港科技大学）

总 序

商务印书馆要出版一个“国外语言学译丛”，把当代主要在西方出版的一些好的语言学论著翻译引介到国内来，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有人问，我国的语言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有自己并不逊色的传统，为什么还要引介西方的著作呢？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大体而言东方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学有差别这固然是事实，但是东方西方的语言学都是语言学，都属于人类探求语言本质和语言规律的共同努力，这更是事实。西方的语言学也是在吸收东方语言学家智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现在新兴的、在国内也备受关注的“认知语言学”，其中有很多思想和理念就跟东方的学术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又有人问，一百余年来，我们从西方借鉴理论和方法一直没有停息，往往是西方流行的一种理论还没有很好掌握，还没来得及运用，人家已经换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了，我们老是在赶潮流，老是跟不上，应该怎样来对待这种处境呢？毋庸讳言，近一二百年来西方语言学确实有大量成果代表了人类语言研究的最高水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需要的是历史发展的眼光、科学进步的观念，加上宽广平和的心态。一时的落后不等于永久的落后，要超过别人，就要先把人家的（其实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好的东西学到手，至

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

还有人问,如何才能在借鉴之后有我们自己的创新呢?借鉴毕竟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近一二百年来西方语言学的视野的确比我们开阔,他们关心的语言数量和种类比我们多得多,但是也不可否认,他们的理论还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印欧语中心”的偏向。这虽然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在借鉴的时候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批判的眼光是不可缺少的。理论总要受事实的检验,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语言类型上有跟印欧语很不一样的特点。总之,学习人家的理论和方法,既要学进去,还要跳得出,这样才会有自己的创新。

希望广大读者能从这套译丛中得到收益。

沈家煊

2012年6月

以语言史为研究目标的语言地理学

(中文版代序)

在东方的语言地理学发展中,日本学者一直走在前列。自 20 世纪 30 年代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蜗牛考》出版以来,日本的语言地理学发展迅速,形成了以贺登崧(比利时籍)、柴田武、德川宗贤和岩田礼、平田昌司、太田斋、远藤光晓等两代学者为代表的研究群体。他们不仅深入田野,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日本语言地理学和汉语方言地理学的调查研究,而且在理论方法上也有许多探索。柴田武《语言地理学方法》(《言語地理学の方法》)就是这一系列调查与研究后的有关语言地理学方法论的思考。

柴田武(Shibata Takeshi, 1918—2007),日本著名语言学家。1942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语言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研究员(1949—1963)、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1964—1967)、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1968—1978)、埼玉大学教养学部教授(1979—1984)。2007 年 7 月 12 日于神奈川县横须贺市浦贺医院去世,享年 88 岁。

柴田武教授是一位将毕生精力贡献给语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及词典编撰等研究领域的语言学家。他的著述很多,著作有《文字与语言》(刀江书院,1950)《日本的方言》(岩波新书,1958)、《活着的方言》(筑摩书房,1965)、《词语的社会学》(日本放送出版协

会,1965)、《语言地理学方法》(筑摩书房,1969)、《社会语言学的课题》(三省堂,1978)、《柴田武日语随笔》(大修馆书店,1987)、《丝鱼川语言地图》(秋山书店,上卷:1988;中卷:1990;下卷:1995)、《词汇论の方法》(三省堂,1988)、《方言论》(平凡社,1988)等 20 多部。他曾与他人合作编撰了一些有价值的辞书,如:《新明解国语词典》(三省堂)、《世界的词语小事典》(大修馆书店,1993)、《世界谚语大事典》(大修馆书店,1995)、《明解物语》(武藤康史,三省堂,2001)、《类语大辞典》(山田进,讲谈社,2002),合著和译著也有 10 多部。他长期从事日本语教育工作,曾在 NHK 电视台主持并出演《日本语再发见》栏目,曾获 NHK 放送文化奖(1985),长期担任财团法人日本罗马字社理事长,是国字罗马字论的领军人物。

关于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柴田武主要有三部重要著作,一部是专著《语言地理学方法》(1969),一部是《丝鱼川语言地图》,另一部是与贺登崧合作翻译的《语言地理学入门》(科赛留著,1981)。前两部著作是作者基于田野调查的理论思考和方言地理研究。为了“验证早已进入日本并正式用于日语区的语言地理学方法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寻找新的研究方法”(柴田武),柴田武和贺登崧、德川宗贤、马濑良雄等曾于 1957、1959 和 1961 年在日本新潟县丝鱼川和青海地区进行语言地理学调查。由于丝鱼川和青海地区是日本著名的东西两大方言的接触地带,方言差异非常复杂,所以,调查筛选了存在明显地域差异的项目,其中语言内项目 442 个,语言外项目 19 个;后在调查中又舍弃了一些项目,共 385 个。他们深入最基层的社区,调查了约 180 个社区(地点)。在对丝鱼川和青海地区方言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柴田武对语言地理学理论、方法及具体做法做了深入思考,后来写成了《语言地理学方法》,于

1969年由日本筑摩书房出版。这是日本语言学界首次讨论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并以此尝试建构该区域的语言史。

2004年11月,时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的张维佳应邀访问日本金泽大学,岩田礼教授向他极力推荐柴田武先生这本《语言地理学方法》。几年以后,岩田教授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崔蒙考入张维佳门下,攻读汉语方言学与语音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在博士课程“语言地理学”上,张维佳教授推荐这本《语言地理学方法》作为她学习的重要参考书,并嘱其翻译成中文。这本书的翻译得到岩田礼、石汝杰等教授的支持和关心,岩田教授特别赠予了原著及相关图片,石汝杰教授提供了与作者有关的背景信息。如果没有这些先生的积极推动,柴田武教授的“以语言史为研究目标”的语言地理学思想与中国语言学仍有隔山隔水之远。

《语言地理学方法》是柴田先生在对日本语言地理深入调查基础上所做的理论思考。全书共有五章内容:第一章 语言地理学的目的和方法,第二章 建构语言史的线索,第三章 从语言地图到语言史,第四章 语言地理学建构的语言史的性质,第五章 今后的语言地理学。全书除了第三章是对丝鱼川和青海地区方言项目做个案研究外,其他各章基本是理论方法方面的探讨,对语言地理学的性质、基本理论、操作方法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

从现代语言学发展史来看,语言地理学是为了验证新语法学派的经典规则“语音演变无例外”的适应性而产生的语言学新理论。19世纪70年代,“新语法学派”对语音发展规律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语音演变无例外”的论断被奉为语言学界的圭臬。但是,人们还是发现,在标准语中还存在一些不规则的成分,而这些成分是异质语言混合而成的。正像布龙菲尔德在介绍语言地理

学产生时所说的:历史比较法“假设母体语言的内部一致和突然的明确的分裂,同时又会揭露一批多余的形式,那是按照这个假设所不能解释的。比如,印欧语领域内许多错综的大规模的同语线,给我们显示了印欧语系的诸分支并不是由内部绝对一致的母体突然分裂而产生的。”“我们不妨说,母体在分裂以前就有了方言的分化,或者说,分裂以后姊妹语群彼此间仍然保持接触互相往来;两种说法都等于说,在某些方面已经出现了分歧的各区域或各区域的不同部分可以仍然发生共同的变化。因此,继续不断的变化的结果就在整个领域上形成了错综的同言线网”^①。要研究这些异质成分,需要把视角放在地处偏僻的乡村方言。继德国温克发现“莱茵扇”之后,法国的齐列龙也发现:所谓的“条件性音变”是以词的形式表现出一定的地理差异,从而提出“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一语言地理学的著名论断,形成了与新语法学派对立的语言学理论。日本语言地理学步印欧语言地理学之后尘,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了对日本语长达半个世纪的语言地理学的调查与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理论方法,其精华集中在柴田武的《语言地理学方法》一书中。

“语言地理学是研究语言史的方法之一,其目的在于阐明语言的历史。”“语言地理学的任务就是从地理分布的空间走向语言史的时间”。这是柴田武反复强调的语言地理学的性质。这种方法不仅仅是画一幅幅语言地图,指出方言差异的地域变体就可以了,而是在对反映具体义项的语言形式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地

①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04页。

图标注的方式,表达研究者对语言地域变体历时变化及其成因的基本判断。“根据地理分布建构语言史是语言地理学独有的工作,也是语言地理学方法所考察的核心问题”。语言史是语言地理学的终极目标,这也决定着,语言地图并非语言地理研究的工具,而是语言地理研究的本体。

在柴田武看来,语言地理学研究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文献语言学等的研究都有所不同。与历史语言学相比,(1)语言地理学关注具有地域差异的语言,哪怕是具有细微差异的反映在性别、年龄、居住经历、学历、职业等层面上的地域变体,以及主观内在条件(发音人自身主观判断)。而历史语言学关注某种语言相对标准的形式。(2)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材料是现代口语,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材料既有现代的口语,又有过去的书面语。“口语和书面语是两种异质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地理学研究的材料是同质的。”(3)语言地理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都关注语言演变的过程和历史,但前者除了研究者对语言地理差异的观察外,还要重视发音人对自己语言的“内省判断”,语言地理学所构建的语言史,可以说是其与民众共建的语言史,“语言地理学正是从语言的个体使用方面去构建语言历史的”,这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纯“客观”的学者研究构筑的语言史形成鲜明对比。(4)语言地理学建构的语言史,分期细致、分化与融合关系清楚,其所构建的语言史大约在100年之间;历史比较语言学却不同,因有文献语言学的支持,它所构建的语言史可以在数百乃至数千年间。(5)语言地理学构建语言史的目的在于解释语言历时变化的过程与成因,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目的在于寻找原始祖语。从这点上看,前者以变化的起点往后看语言的发展,后者是从现代的语言差异探索原始语

言的基本面貌,是往前看语言的形成。而这种原始祖语只是一种学者的假设,与历史上真正的原始语言可能会有一定距离。(6)语言地理学的工具是语言词(概念)的系统性差异,A系列中a-1、a-2、a-3、a-4、a-5、a-n等的地域性差异是观察语言史的窗口;而历史语言学的武器是“语音法则”,即语音对应的系统性。(7)语言地理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对语言的基本假设不同。前者认为,同一地域社会成员并不一定使用相同的语言,即使同一地域社会内部也存在空间阻隔,所以语言接触是其关注的重点;后者认为,地域社会的所有成员共有同一语言结构,语言的传播性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关注的重点。当然,语言地理学也关注“传播”,这种传播“是指语言同一化在地域中推进的过程”。(8)语言地理学认为“语言要素(语言形式)在地域上存在着有序的地理分布”,通过这种地理分布构建语言的历史是语言地理学家的重要任务;历史比较语言学则认为,语言结构内要素之间存在着有序关系,结构的系统性是构建语言历史的重要线索。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相比,语言地理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不同在于二者持有不同的基本假说。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同一地域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是基本相同的语言,语言地理学却认为同一地域社会的成员并不一定使用相同的语言,因为空间地理的阻隔会破坏语言的统一性,语言差异也因此产生;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对地域成员交际的一致性具有强制要求,而在语言地理学看来,说话人会使用自己的语言与对方的语言同一化,而这种同一化的过程就是语言地理学所说的语言在地域中“传播”的过程;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要素之间存在着有序的关系,并将这些关系总称为结构(体系),语言地理学认为语言要素(语言形式)在地域上存在着有序的地理分布,这种空间有序是

指可以凭借地理分布去建构历史的地域间关系。

正如上述,语言地理学是一种探索语言史的学问,其研究对象是现代口语的地域变体。词语的地理分布、词语变体在不同年龄层中的分布、系统内不同词语的地理分布、词语理解的地域差异、事和物的地理分布、发音人的判断和理解、同一地域社会中的年龄差异、语言形式的特征等是语言地理学研究语言史的八条重要线索。其中:观察词语的地理差异要根据“邻接分布”和“周圈分布”原则来推断语言史,要将与老年段相对的青年段或中年段的地理分布作为研究语言史的线索,要关注所有词语地理图中那些具有相似分布的地理区域(即在“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区域中寻找不同词的地理共性),不仅要重视词语的使用形式,同时也要重视词语的可理解性(二者在地理上不一定完全对应),要关注不同地域发音人对新旧词语和词语来源的认识和解释(而不仅仅是专家的研究),要关注表示相同意义词的地域差异和年龄差异之间的关系。在日本语言地理学家看来,语言地理学既然是一种从地理分布建构历史的方法,那就必须将语言形式差异、词义差异、认知差异、年龄差异以及系统内不同词语之间差异的地理分布作为调查研究的头等重要的工作。否则,“作为语言史方法的语言地理学就会失去意义”。柴田武在日本丝鱼川市的三次语言地理学调查(1957,1959,1961),就是在上述理论指导下展开的。

至于日本语言地理学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柴田武在第五章“今后的语言地理学”中也有论及。首先,语言地理学是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文献语言学的补充和加强,而不是作为其对立面,它要解决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所着重探讨的一些问题,如:语言分化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如何发展的,尤其是由A分化出B和C后,不同语言又是如何接触的。其次,如何处理语言结构的历史和单一

词语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传统的语言地理学调查一般不关注意音系学的方法,只关心词语形式的语音差别,并将此原封不动地标注在地图上加以解释。当代语言地理学应该将通过结构地理分布构建的历史与通过语言要素(如词)地理分布构建的历史结合起来,这样构建出的语言历史才是语言真正的历史。第三,如果将语言地理学只看作寻找语言分界线的方法,那就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学问的性质。“语言地理学的目标是建构语言变迁的轨迹,探究变迁的成因。”因此,语言地理学必须在厘清语言地理区划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地理差异中所反映的语言历史秩序。

日本语言地理学发展有两个途径,一是以柳田国男为代表的日本民俗学,从对事和物的考察到对不同区域词的调查,从而形成建立在周圈分布和邻接分布两个分析原则之上的日本传统语言地理学;二是由贺登崧神父领衔的现代语言地理学,重视从词语空间差异来分析其历史发展。正是贺登崧神父将在中国大同和宣化两地的调查积累的经验带到了日本,才促使日本语言地理学的现代转型。而这第二个途径跟汉语方言地理学有关。21世纪初中国方言学界重新咀嚼贺登崧神父的语言地理学的时候,日本新一代语言地理学专家岩田礼、平田昌司、太田斋、远藤光晓等教授也将日本的语言地理学思想介绍到中国,他们有关汉语方言地理学的思路 and 做法很明显来自贺登崧、柴田武、德川宗贤等老一代专家。因此,柴田武教授这本《语言地理学方法》中译本的出版,对正在复兴的“以语言史为研究目标”的中国语言地理学的健康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

张维佳

2017年7月16日

序 言

从 1957 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做新潟县丝鱼川地区的语言地理学调查。在整理调查材料的过程中,又尝试思考语言地理学的方法在普通语言学上的意义,从而形成了本书的内容。

尽管语言地理学的方法是语言学史上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但我认为,正是这种方法把我们从片面理解语言本质的危机中解救了出来。自从语言学分为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以来,二者中的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避免对语言学本质的认识产生片面的理解,作为共时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也不例外。

语言既是一种静态的结构,也是历史的产物。但是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语言地理学方法正是为了能够在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语言的共时结构和历时发展这两方面做出调和。

从语言学史上看,语言地理学是作为比较语言学的“救援”方法登场的。这样看来,这种方法似乎带有一定的被动性。但语言地理学又是一种探寻某地民众在语言上的个性和创造力、从语言方面探究人与人关系的主动性方法。关于这一点,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讨论。

除了丝鱼川地区的调查之外,从始于 1949 年、持续了 15 年多的全国实地调查中,我得到了以下几点心得:第一,那些久居当地默默无闻的老人们所说的语言里有十分深刻的含义。现在对我来说,他们并不是作为试验对象的发音人,而是跟我同在一个社区共同经

营语言生活的亲切邻居。第二,我确信,不管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有多么强大,方言绝不会有消失的一天。现在中央政府推行的日语标准化工作开展得越多,代表个别性的方言也就越发闪耀着光辉。

在语言地理学的方法上,为我开拓眼界的是贺登崧神父。虽然大学一年级时(1938),我在小仓进平先生的语言学研讨课上读过多扎的《语言地理学》,已经学习了语言地理学及其相关知识,但是将这些知识转化为现实经验,还是从与贺登崧神父一起做丝鱼川调查开始的。

除贺登崧神父之外,参加丝鱼川调查的还有德川宗贤和马濂良雄两位合作研究者。本书中约四分之三的资料是由这二位先生收集的。

丝鱼川调查所得到的材料现在还在整理中,我正努力让这些材料能够尽快面世,届时将会是一本含有 700 多幅地图的《丝鱼川语言图卷》。本书也可以说是这本语言图卷的中期报告。但是本书的理论和阐释都来自我个人。同时还要提前说明的是,从整体来看,本书不是对国外已有学说的继承,只是我个人思考的产物。

本书草稿写成之后,恩师服部四郎先生通读了全稿,这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服部先生还就草稿与我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我们讨论的成果也体现在本书之中。

如果没有贺登崧神父这样的前辈学者,我大概不会开始语言地理学研究;如果没有两位合作研究者,我手中也许不会有丰富的研究材料可供思考。另外,如果没有幸得服部四郎先生这样的批评者,这本书可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对如此种种,我的心中只有深深的感谢。

柴田武

1969 年 5 月 5 日赴纽约前日于东京